



中国文化
语言学丛书

主编 / 申小龙

李葆嘉 / 著

广东教育出版社

当代中国音韵学

不同的语音研究方法的自在形成，

受制于主体对母语不同的自然感知；

不同的语音自然感知，

取决于所操语言的不同类型。

华夏汉人对其母语的自然感知表现为音节性、

随机性、音乐性、附义性与比况性。

这是第一部以文化学方法研究汉语音韵的语言学专著

也是以汉语音韵为研究对象的第一部文化学专著。

中国文化语言学丛书·主编·申小龙

当代中国音韵学

李葆嘉·著·广东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当代中国音韵学/李葆嘉著

—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

(中国文化语言学丛书/申小龙主编)

ISBN7—5406—2891—X

I. 当…

Ⅱ. 李…

Ⅲ. 现代音韵—汉语—中国

IV. H11

*

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肇庆新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肇庆市郊狮岗)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3.25 印张 250,000 字

1998 年 10 月第 1 版 199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ISBN 7—5406—2891—X

H·44 定价：18.5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厂联系调换。

与以往的汉语音韵学专著有所不同,本书试图以新的范式,立足于汉语音韵的人文属性,立足于东西方语言语音结构与语音分析的异同,对汉语音韵学展开思辨性、民族文化性与历史性的回溯,对汉语音韵的人文内涵进行开拓性探讨。

不同的语音研究方法的自在形成,受制于主体对母语不同的自然感知;不同的语音自然感知,取决于所操语言的不同类型。华夏汉人对其母语的自然感知表现为音节性、随机性、音乐性、附义性与比况性。这种独特感知制约着对汉语音韵的质朴把握、分析理解、系统描写与历史重建。

传统汉语音韵研究散发着浓郁的人文气息,在汉文化与外来文化的撞击中不断突进。约而言之,凡六变:汉末胡书导致反切出现,为一变;南朝转读触发四声发现,为二变;鲜卑汉化亟待正音而《切韵》问世,为三变;参对体文创字母,模仿悉昙制等韵,为四变;以八思巴字与罗马字的音素式方法分析汉语音节,为五变;运用历史比较法重建中国古音,为六变。基于汉人语音直感的人文型描写方法与置于汉文化生态环境之中的人文性阐释方法,在汉语音韵研究中和谐相协。

浸透着西方人文传统的历史比较语言学引入中国音韵学以后,使中国古音重建有了新的利器。但是,中国古音学与西方历史比较语言学有本质的差别。材料的模糊状态与框架的精致趋势,结论的或然性质与治学的拘执态度,学科的开放性质与研究的封闭状态,成为音韵研究中要化解的一些矛盾。

语音系统并不仅仅是音位系统。封闭的、抽象的音位系统寓于开放的、具体的词音系统之中。词音系统并不仅仅简单的表现为语义的听觉载体或物质外壳，它本身就是一种认知方式，一种价值系统，一种文化形态。在这种观点审视下的音韵，可以称之为“音韵文化”。

蕴含在华夏汉语音韵系统中的文化功能，具有宣泄功能、认知功能、美学功能与社会功能。汉语音韵研究的人文传统，集中表现为感受性、综合性、阐释性与应用性。汉语音韵研究是在人文学科方法运用的襁褓中成长起来的，除了传统的人文方法，文化语言学研究中的文化认同法、文化基层法、文化镜象法、文化耗散法、文化比较法，在汉语音韵研究中都可以得到广泛运用。

一些文化史家滥用音同音近，曲为立说，以致白云苍狗、指鹿为马。文化研究亟待汉语音韵的导入，以帮助文化史家走出“因声求义”的误区。

作为第一部以汉语音韵为对象的文化学专著，或第一部用文化学方法为工具的音韵学专著，其旨趣就在于和广大学人共同进行跨学科探讨，为世纪之交的中国新文化建设添砖加瓦。

Abstract

Different from the formerly special works on Chinese Phonology, this book tries a new pattern to have a rational, nation—cultural and historical recall of the Chinese phonology at the angle of humanist attribute of the Chinese sound and phonology, of phonological structure, the similarity and difference of analysis between the Western and Eastern languages, and studies the humanistic connotation of the Chinese sound and phonology in a pioneer way.

The natural formation of the different phonological research method is restricted by the different natural perception of the perceiver toward the mother tongue. Different phonological natural perception is determined by the different type of language the perceiver speaks. The natural perception of the Huaxia—Han (华夏汉人) nationality toward their mother tongue manifests as syllability, randomization, musicalization, meaning—attaching and comparatability. This special perception restricts the simple and unadorned master of, analysis and understanding of, systematical description of, historical reconstruct of, the Chinese phonology.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phonological research was full of strong humanistic flavour and continually progressed in the conflict and blend between the Han culture and the foreign ones. In

a word, there were six changes; the Buddhist Scriptures from non-Han nationalities living in the Western Regions in the Later Han Dynasty (汉末) led to the appearance of “fan-qie” (反切), it was the first change. The reading and singing of the Buddhist Scriptures caused the discovery of “four ton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in the Southern Dynasty (南朝), it was the second. When Sien-pi (鲜卑) minority’s Hanization needed standard pronunciation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s, *Qie-yun* (《切韵》) was born, it was the third. The comparasion of and reference to the Sanskrit and Tibetan alphabets created initial consonant representing Chinese characters and the phonological-table was made by imitating Siddham, it was the fourth. The fifth was analysing the Chinese syllables by Phagspa-script and Roman phonemic method. The sixth was reconstructing the Chinese ancient phonemes by the historical comparative linguistics from Europe. In the Chinese phonological research, the humanistic descriptive method based on the Han people’s phonological perception was in the harmony with the humanistic interpretative method in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of the Chinese culture.

Introducing the historical comparative linguistics infusing the Western humanistic tradition into the Chinese phonological research added a useful tool to the reconstructing the archaic Chinese sounds. But the Chinese ancient phonology has an essential distinction with the Western Europe historical comparative linguistics. The obscure state of materials and elaborate tendency of the frame, the probability of the conclusion and stubborn research attitude, the open feature of the subject and the closed state of the research are the pairs of contradictions to be solved

in the phonological research.

The sound system is not the phonemic system. The closed and abstract phonemic system resides in the open and concrete word-sound system. The word-sound system does not simply express as semantic auditory carrier or material shell. It itself is a kind of perceptive fashion, a system of value and a cultural form. In this viewpoint, the sound system can be called "phonological culture".

The cultural function in the Chinese sound system has the function of unbosom, of perception, of aesthetics, of society. The humanistic tradition of the Chinese phonological research epitomizes as perceptiveness, comprehensiveness, interpretativeness and applicativeness. The Chinese phonology is growing in the course of application of the humanistic method. Besides the traditional humanistic method, the method of cultural identity, of the cultural base, of the cultural mirror image, of the cultural dissipation, of the cultural comparasion in the cultural linguistic research can be widely used in the Chinese phonological research.

Some cultural historians established hypothesis by misusing identical and similar word-sounds. As a result, they called white black. The culture research needs greatly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Chinese phonology to help them to master the correct method of "getting the meaning from the word-sound".

As the first cultural special works which deals with the Chinese sound and phonology as its research object, or the first Chinese phonology special works which uses the cultural method as the research tool, the author wishes to have a trans-subjects

study and discussion with other scholars in order to make a bit contribution to the Chinese new culture at the turn of the 21th century.

(英译：邝嘉敏)

《中国文化语言学丛书》总序

申 小 龙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建立起来的中国现代语言学，已走过了近一个世纪的历程。如果说在上一个世纪之交，语言文字的研究与革新曾成为中西文化交流、冲突、震宕的先导，那么在即将来临的下一个世纪之交，在中国走向世界的现代化热潮中，语言的研究与革新将再次拉开中国新文化建设的序幕。站在这个新世纪的起点上，作为中国现代语言学跨世纪的一代，适时地回顾 20 世纪中国语言学的发展，努力为新世纪的中国语言学选择和建树新的理论、方法乃至文化哲学的基础，是十分必要的。

20 世纪的中国语言学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即它是在西方文化作为一种“船坚炮利”的“优势文化”的巨大冲击下开始现代化的，由此形成这样一种研究规范：

其一，它不由分说地套用西方语言理论的范畴和体系，未曾考虑这些范畴、体系和方法源出于与汉语很不相同的印欧语。根据现有的语言资料，汉语和印欧语在结构形态、组织方略和文化精神上分别处于人类语言连续统的对立的两极。

其二，它从一开始就接受了西方近代科学的形式化宗旨，把形式化作为语言分析的终级目的，未曾考虑汉语没有印欧语那种丰满、裸露的形态标记，汉语的析解具有很强的人文性；更未曾

考虑语言分析的终极关怀不是形式，而是内容。

这样一种研究规范使曾与中国文化血肉交融在一起的传统汉语研究在本世纪发生了深刻的异化，即它不再以使用母语的人与文化为目的，而以某种理想化的形式为目的；不再以汉族人的语感作为建立范畴的深厚基础，而力图以西方语言的“科学”范畴来规范汉族人的语感。这样一种研究规范，在其长足的发展中，必然伴随着语文感受、文化心理的矛盾而冲突与困惑。它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付出了文化断裂的深刻代价。

鉴于对 20 世纪中国语言学的历史反思，我们从 80 年代中期开始突破西方语言理论框架，寻找、实践一种与汉语的文化性征相适应的语言分析理论和方法。这种理论和方法设立了两个科学的参照点：

一、汉语与中国哲学、艺术、文学、美学乃至思维方式方面所具有的文化通约性。这种通约性使我们可以从中国文化的其他样式入手反观汉语的建构特点，从较深的层次上把握汉语的文化性征，以此规定汉语的整个结构蓝图。

二、中国古代语文分析传统中所运用的范畴和方法。这些范畴和方法贴近中国人的语感，在加以科学地整理和阐释后，能够转化为现代汉语分析的基础。

这样一种新的研究范式，我们称之为文化语言学。近年来，在中国语言学的各个领域，以汉语的人文性为本体论，以汉语的文化性征和中国语文传统的科学分析与阐释为方法论的两翼的新语言学范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一大批中青年语言学者正以崭新的步伐迈向 21 世纪。为了在中国语言学的各个学科系统地阐述语言学新范式的理论和方法，从而为 21 世纪的中国语言学奠定理论和方法论的基础，我们撰著和出版了这套“中国文化语言学”丛书。这既是一套中国语言学各领域的学科建设丛书，也是一套中国语言学各领域的理论、方法探索丛书。丛书中的每一本因学科

对象和作者专攻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写法和重点，但基本上循着这样一个大思路：

首先是对该学科在 20 世纪发展的历史回顾与反思；

其次揭示该学科研究对象的文化内涵，从而树立新语言观；

再次是重新认识和阐释该学科在中国古代语文传统中的研究范畴、方法、理论，揭示其现代意义；

然后系统论述该学科研究的新方法，以丰富的材料对新方法加以实证；

最后展望该学科在 21 世纪的前景。

在中国现代语言学走向新世纪的时刻，能够在语言学的十个主要学科——语法学、词汇学、修辞学、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方言学、理论语言学、民族语言学、语言学史学——形成这样一个继往开来的大思路，充分说明中国语言学的新规范正在中国年轻一代语言学者的勤奋探索中孕育成长。本丛书的出版标志着文化语言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它必将为中国语言学划出一个时代。

本丛书的撰写邀请全国高校中卓有建树的中青年语言学教授、博士参加。这些学者在各自的研究领域运用人文科学的语言和方法，取得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学术成就。他们不仅继承了前辈语言学者，如陈望道、张世禄、郭绍虞、王力、陆宗达、罗常培、季羨林、吕叔湘、张志公、裘锡圭等的思想和传统，而且以自己新的理解和阐释赋予传统以新的生命。

本丛书荣幸地聘请著名前辈学者季羨林、张志公和许威汉先生担任顾问。他们对丛书的思路给予热情的肯定，并给我们以深刻的指教。季羨林先生对我们说：“汉语研究几十年来陈陈相因，这样的状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必须用中国文化的眼光看待汉语。”“一个民族典型的思维方式，是一切精神文明（甚至一些物质文明）生产的基础，它必然表现在各个方面。”季先生指出：

我认为，从人类整个历史来看，全世界人民共创造出来了四个大的文化体系。所谓“大”指的是历史悠久、影响广被、至今仍然存在的文化体系。拿这个标准来衡量，我发现了只有四个：中国、印度、伊斯兰和欧美。其中前三个属于东方文化范畴，第四个属于西方。东西两大体系，有相同之处，也有相异之处，相异者更为突出。据我个人的看法，关键在于思维方式：东方综合，西方分析。所谓“分析”，比较科学一点的说法是把事物的整体分解为许多部分，越分越细。这有其优点：比较深入地观察了事物的本质。但也有其缺点：往往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所谓“综合”就是把事物的各个部分联成一气，使之变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强调事物的普遍联系，既见树木，又见森林。普遍联系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它完全符合唯物辩证法。我浅见所及，东西文化的根本差异即在于此……

我想先从医药中举一个例子。人们都知道，西医和中医是完全不同的，两者的历史背景完全不同，发展过程也完全不同，因此，诊断、处方、药材等等都不一样。最明显的差别是大家所熟知的：西医常常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中医则往往是头痛医脚，比如针灸的穴位就是如此。提高到思维方式来看，中医比西医更注重普遍联系，注重整体观念。

再拿语言文字来作一个例子。西方印欧语系的语言，特别是那一些最古老的如吠陀语和梵文等等，形态变化异常复杂，只看一个词儿，就能判定它的含义。汉语没有形态变化，只看单独一个词儿，你就不敢判定它的含义。必须把它放在一个词组或句子中，它的含义才能判定。使用惯了这种语言的中国人，特别是汉族，在潜意识里就习惯于普遍联系，习惯于整体观念。

再如绘画，中西也是不相同的。许多学者，比如申小龙先生等，认为西画是“焦点透视”，中国画是“散点透视”。你看一幅中国山水画，可以步步走，面面观，“景内走动”，没有一个固定的焦点。申小龙还引用了李约瑟和普利高津的意见，认为汉民族有有机整体思维方式。

从上面几个简单的例子中可以看出中国文化的特点。约而言之，这个特点可以归纳为普遍联系和整体观念。从“科学主义”的观点上来看，这未免有点模糊，但是这个“模糊”却绝非通常所谓的“不清不楚”，而

是有比较严格的科学含义，它强调的正是普遍联系。^[1]

季羨林先生的意见无疑是我们这套“中国文化语言学”丛书之思想和理论基础。事实上，“五四”以来中国著名的语言学者在这一点上有深刻的共识。何容先生指出：“自《马氏文通》以来的中国语法学，恐怕大部分通则，甚至整个的基础，是用演绎的研究法建立起来的。”“是把欧洲语言里的文法里的通则，拿来支配我们的语言。”^[2]王力先生指出：“现在我们天天谈汉语特点，天天还是在西洋语法的范围内兜圈子。必须跳出了如来佛的手掌，然后不至于被压在五行山下。”^[3]我的导师张世禄先生指出：一个世纪以来，“研究、学习汉语语法的，几乎全部抄袭西洋语法学的理论，或者以西洋语言的语法体系做基础来建立汉语的语法体系”。“（洋框框）捆着本世纪的汉语语法学，使它不从正常健康的方向发展，而向着复杂畸型的方向发展。”^[4]张志公先生指出：“我们的语法学至今很不成熟，主要缺点是不完全符合汉语特点，或者说，基本上不符合汉语特点。”^[5]“从《马氏文通》直到今天，对汉语语法的研究，从概念、术语到方法，基本上都是从国外引进的。所引进的这些东西，不论是对某种语言的语法的具体论述，或者是对于一般语法理论的探讨，都没有或者很少把汉语考虑在内，没有把汉语作为建立理论的基础。而汉语在世界各种主要语言中，具有较大的特殊性。”^[6]陈望道先生说得更为概括：“一般语言学的理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能，或者说很少能充分地、正确地概括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历史极其悠久，既丰富又发达的汉语事实和规律。”^[7]而季羨林先生的论述，正是从根本上揭示了汉语研究这种缺陷的文化根源。他以一个东方文化学者的慎思明辨提出以综合为基础的东方文化的现代意义，并充分肯定了文化语言学的运思方向。正如他与我交谈中所说：“用中国文化的眼光看待汉语，这不仅是为了中国，而且是为了世界。东方文化一定会将人类的文化提到更高的水平。”

本世纪 80 年代以来我国语言研究中的文化语言学大潮，本质上是东方语文精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复兴，是历经“分析的时代”的中国语言学走向新的生命的一场范式革命。这场革命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反响。国内成立了中国语言文化学会，并已连续六年召开全国文化语言学讨论会。日本中国语学会和东京大学等高校也邀请我讲学。我深切感受到这场变革对于东方各民族语文传统寻求健全的现代转型的深刻意义。汉语研究的现代化不是为西方语言理论提供一个东方语言的例证（即使是作了很大理论修改的例证），而应是以对中国语言具有永恒意义的语文精神的现代阐释，去丰富人类对语言的认识。

本丛书的出版得到广东教育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尤其是责任编辑姚自力、潘英伟先生对丛书及其作者的深刻信任令我们感动！两位先生曾与我专程在上海和北京拜访丛书的顾问和其他专家学者，充分论证选题，并在广州和襄樊先后两次召开全体作者会议，讨论撰写中的具体问题。正是在他们的促进下使这一宏大的科研、出版计划得以实施。我谨代表全体作者向他们暨广东教育出版社表示深切敬意！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我们这一代学者从“上山下乡”中走来，将以自己不折不挠的毅力、创造精神和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告别 20 世纪。新的世纪将是人类文化在新的历史层次上更为绚烂而非简化的世纪。在这个世纪，正像我为日本东京大学的题辞所言——

“东方语言文化具有永恒的魅力！”

1993 年 9 月 12 日

注释

[1] 季羡林《神州文化集成序》，新华出版社 1991 年版。

- [2] 何容《中国文法论》，商务印书馆 1985 年版。
- [3] 王力《语言的民族特点和时代特点》，载《中国语文》1956 年第 10 期。
- [4] 张世禄《关于汉语的语法体系问题》，载《复旦学报》1980 年语言文字增刊。
- [5] 张志公《闲话语言》，载《扬州师范学院学报》1980 年第 21 期。
- [6] 张志公《关于建立新的教学语法体系的问题》，载《教学语法论集》。
- [7] 陈望道《文法简论》，上海教育出版社 1978 年版。

导 论

树木苍翠，绿草如茵，鱼儿跃出水面，羊儿咩咩叫唤，孤独的亚当徘徊在雾气袅袅的山坡旁。万能的上帝用土造成各种飞鸟走兽，都带到亚当面前。亚当怎么叫这个动物，这个动物便有了它的名字。于是，亚当给空中飞鸟、野地走兽等一切动物都取了名字。仁慈的上帝又给他造出了她。金灿灿的伊甸园里，亚当与夏娃用美妙的声音交流感受。充满了人类童真幻想的《创世纪》，把人类语言力量的来源归诸于神，然而这个神不是上帝，而是人本身。人的符号创造力造就了语言与文化。

语音：人类文明的原生形态 根据地质学、天文学、古生物学等许多学科的综合资料，地球大约形成于46亿年以前，生物已经有了36亿年的历史。姑且把生物出现后的36亿年算做1年，那么1天差不多等于1000万年，每小时等于42万年，每分钟等于7000年。在这个缩微的生物演化史时间内，如果1月1日生物